

新國際經濟情勢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邱俊榮

摘要

全球製造活動正減弱，美國通膨趨緩、經濟呈現韌性，歐洲陷入溫和衰退，中國從新冠疫情封鎖中恢復的局勢正在放緩，許多新興市場繼續與沈重的債務負擔和高利率搏鬥。現在全球經濟面臨的問題是，能否持續避免各種威脅帶來的嚴重後果，包括從通貨膨脹到全球貿易放緩。答案仍繫於通膨的僵固性及其對實體經濟的威脅，以及全球「去風險化」的二元發展造成的供應鏈重組。此外，全球不得不採取的合作項目也將深刻影響全球經濟中長期的發展態勢。

壹、前言

近五年來，全球經濟受到美中經濟衝突、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中國人事與政策更迭等衝擊，已經帶來包含供應鏈重組、民主威權二元對立、通貨膨脹、國際資本移轉快速、成長動能衰退等前所少見的現象。時序進入 2023 下半年，這些現象或有所緩解，或仍在加劇，正在形塑新的國際經濟情勢。本文將就正在左右全球經濟情勢的重要原因加以檢視，試圖勾勒國際經濟可能的新面貌。

貳、通貨膨脹影響深遠

全球兩年來的嚴重通貨膨脹，源自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以下簡稱聯準會）2020年三月起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所採取的快速且大幅度的貨幣寬鬆政策，再經疫情期間商品供應鏈中斷、國際運費大漲等供給面衝擊，至2021年起一發不可收拾。儘管美國聯準會事後承認誤判通膨情勢並展開升息循環以抑制通膨漲勢，但各國央行延誤採取緊縮時機使得通膨巨獸邁入僵固化，並不易馴服。至今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雖已降至3%的近兩年低點，但核心通膨率仍高，遑論還受到通膨嚴重影響的歐洲各國。

無論是否屬於停滯性膨脹，全球通膨的原因之一既是供給面衝擊，就會產生停滯性膨脹的特性——央行既不能採取寬鬆政策以刺激經濟，而採取緊縮措施會產生經濟衰退疑慮，這正是全球近兩年經濟的基本特質。事實上，面對嚴重通膨，以聯準會為首的各國央行已顧不得經濟衰退隱憂，甚至還想藉經濟衰退來抑制可能持續惡化的通膨。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通膨正在趨緩中，雖然全球經濟並未衰退，但其意義也相去不遠。通膨嚴重影響了各國中低收入人民的購買力，造成所得分配的惡化，致使全球消費動能衰退，進一步影響的國際貿易的動能。這由全球各預測機構幾乎均預測今年的全球貿易成長率低於經濟成長率可證。

源於所得分配分化、消費動能低落所造成的全球貿易動能不彰現象殷鑒不遠，2015到2016年正是如此，當時我國也歷經了出口連17個月的衰退。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全球並未有嚴重的通膨現象，對比當時，更有理由擔憂現今國際貿易面臨的惡境。想要國際貿易恢復動能，關鍵在於通貨膨脹率能否很快回到承平時期的水準，以及受到通膨侵蝕的各國消費者購買力是否能夠很快回復。

目前美國通膨在聯準會的升息大力抑制下雖已趨緩，惟由金融市場的表現可知市場資金依舊充沛，這或許是聯準會仍不放棄升息暗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記通膨的僵固性與易反撲性，如果不能確定通膨已受到控制而結束，其對國際貿易等實體經濟的影響仍會持續。

此外，儘管俄烏戰爭可望結束、全球供應鏈也漸回復秩序，還是有若干長期供給面衝擊因素使得物價降低不易。例如，為因應氣候變遷的歐洲、美國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 BCA）及各國碳稅，既屬合理必要成本，就有長期推升物價的力道；又如全

球供應鏈重組，將使全球生產不再以低成本為主要考量，也勢將推升物價。我們或可以說，過去可以透過國際貿易而使全球人民容易獲得生活滿足甚至錦衣玉食的時代可能即將遠颺。

叁、全球供應鏈重組帶來國際分工的新趨勢

21世紀初以來的全球化浪潮近五年來已開始轉向，美國在前總統川普 2017 年上台後開啟對中國的戰略反思，認為中國富強後並未在民主人權上有任何改革，甚至更加箝制國內社會，在經貿上慣以不公平的政策甚至以違反道德或國際規範的方式掠奪利益。因之而起的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次第展開，也開啟了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序幕。

在拜登總統於 2021 年上任後，進一步改變川普的雙邊政策，積極發展多邊主義，拉攏重要盟友圍中抗中，使得對中國的戰略反思也開始獲得西方國家的認同。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基於中俄同盟以及共有的威權體制，西方世界不僅更加重視經濟安全與風險，同時也開始強化民主價值同盟的關係。

在這期間，美國由川普政府後期的乾淨網路（clean network）計畫，到拜登政府的晶片四國聯盟（Chip 4）可為代表。在俄烏戰爭後，民主與威權國家的對峙與二元化發展益為明確，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成形，這項立基於印太戰略、劍指中國的協定被認為是「經濟版北約」，試圖引導產生新的全球供應鏈，所謂「新冷戰」也正式揭開序幕。美國拜登政府的聯合各國圍堵中國策略，到今年 5 月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領袖峰會可以說是集大成而有了里程碑的地位。篇幅頗巨的 G7《聯合公報》強調必須抵禦中國「經濟脅迫」，並且說明與中國並非「脫鉤」（decoupling），而是有必要「去風險」（de-risk）。至此，「去風險」已為未來的美國與歐、亞各盟國對抗中國的科技戰主軸。

西方與中國的對抗引發的供應鏈重組課題，還受到新冠疫情與俄烏戰爭的進一步催化。疫情與戰爭所引發的全球商品鏈斷鏈、塞港、原料與中間產品（特別是晶片）供應中斷等現象，不僅造成運費大漲，各國諸多重大民生、醫療及工業用品更是短缺。這些困境快速翻轉了以比較利益、降低成本為主，卻忽略政治經濟風險的全球化邏輯。至此許多國家與企業都想要提高重要民生產品與關鍵零組件的自製率，「別太依賴他國」的呼聲雀起，台積電被積極邀請至各國設廠正是其例。

供應鏈的重組引發了「短鏈化」的現象，許多人認為這是全球化的倒退。但我們可以說，依據比較利益進行的國際分工仍將存在，這是難逆的市場經濟邏輯，只是更重視安全的「去風險」考量將會矯正過度依賴比較利益原則所造成的國際經濟市場失靈。這一趨勢既起源於對中國戰略的反思而非僅短暫疫情與戰爭衝擊，其歷程必然甚久。

另一方面，全球供應鏈重組也無可避免地受到地緣政治影響。各國完全短鏈化自主生產在比較利益原則下勢不可能，因此在供應安全的大前提下，國際資本撤離中國並快速轉進包含墨西哥、印度及東協各國設立新的生產基地。此一結構性的趨勢將改寫全球生產版圖，而中國經濟榮光恐難再現。

肆、國際合作的必要性正在提升

儘管在全球生產及分工有所謂全球化倒退的疑慮，但全球各國面對的公共議題日多且複雜，在競爭、對抗之餘，也須維持合作態勢，以避免可能的災難。

就全球經貿而言，過去全球化的弊病之一，在於各國為吸引投資所採取的減稅競賽，以及跨國企業透過免稅天堂進行灰色地帶的避稅措施。為此美國現任財政部長 Janet Yellen 在 2021 年即倡議全球最低稅負制，針對大型跨國企業採行全球最低稅負 15%。這當然是對過去受到扭曲的國際投資的矯正，卻也凸顯了對不公平正義的反思總是來得如此之慢，以及大國帶動合作的重要性。

除了經貿之外，全球還有更多重要的公共議題必須仰賴國際合作。例如，為抑制全球暖化必須積極進行的減碳行動與淨零轉型也非藉國際合作不足以成事。又如，在全球衛生健康層面，新冠疫情的爆發與蔓延對各國危害甚鉅，疫情起源雖眾指中國，至今卻仍難釐清。儘管如此，中國對疫情的處理態度與結果不但讓各國付出巨大人命與社會經濟損失的慘痛代價，也讓全球認知到民主與極權政治間的巨大差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引發的能源緊張與糧食危機是另一顯例。也正因為此二事件，西方國家的國際價值同盟與新冷戰格局正式成形。在價值衝突之下，首要課題是捍衛民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認清國家安全與健康衛生重於經濟數字。

總結國際經濟情勢的最新發展，競爭對抗容易但合作困難，卻都是必須也正在同時進行的工作，也說明了美中兩國維持鬥而不破基本格局的原因。🌀